

# 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

## 四維學會和東北軍

戴笠先生曾經對人說過：「我們團體的第一枝筆是王撫洲」，那是因為王撫洲草擬幾件上呈委員長的重要報告，戴先生非常滿意，委員長也採納了報告的意見。最重要的一件報告，是促成貨運管理局的成立。事實上王撫洲是戴笠先生手下的一位極重要的經濟專家，在抗戰後期，對敵經濟作戰是戴先生領導下的重要工作，而策劃這一項工作，就由王撫洲來主持。

王撫洲字公簡，曾經做過張學良的重要幕僚。民國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年）四月十六日武漢成立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，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撤銷，改組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，以張學良為主任，錢大鈞為參謀長，楊永泰為秘書長。王撫洲以秘書名義住在張學良公館樓下，幫他整理外文書籍資料，處理交辦事件。戴先生去看張學良，和王撫洲第一次見面，就在他的房間裏。因為戴先生和張學良的私交非常好，王撫洲和戴先生的關係也就很密切了。

蔣委員長因為張學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易幟擁護中央，促成國家統一，十九年進軍山海關內，驅散擴

大會議，結束中原大戰，功在國家。雖然九一八喪失東北，仍然排除國內對張學良一切的攻擊，對張十分愛護。爲使東北軍的幹部和中央幹部易於團結，樹立東北軍中心信仰，以爲恢復東北的張本，特鼓勵一部分復興社的幹部和東北軍幹部五六十人組織「四維學會」，以張學良爲理事長，王撫洲爲書記長，戴先生和曾擴清等都是參加的重要人員。四維學會可說是復興社的外圍機構，委員長對張學良的信任和希望，真非一般可比。

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武漢行營結束，十一月一日在西安成立剿匪總司令部，張學良以副總司令代理總司令，張公館在金家巷。王撫洲任剿總代理黨政處長，住在張公館旁邊另一棟樓房內，處理四維學會的工作。後來四維學會另設會址，他搬離金家巷。第二年——二十五年秋天，王撫洲原住的房間成爲禁地，原來有一段時間張學良曾讓共產黨董必武住在那裏。

### 西安事變另一內幕

共產黨滲透東北軍，是從上層和下層同時並進。這個時候，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剿匪一再失利，共產黨要求派代表和他談談，他答應了，共產黨派來秦邦憲。秦邦憲能說會道，煽動地說：「東北軍應當打日本，打回老家去。但是國民黨中央不讓你們抗日，而要你們打共產黨。這是一條毒計，要同時消滅共產黨和東北軍，你們爲甚麼不明白？」

王以哲被共產黨迷惑了，約好以後進剿，先給共產黨送個信兒，好讓他們避開。共產黨又把俘虜了的東北軍，經過一番洗腦，招待一番，連人帶槍放了回來。所以，東北軍的剿匪士氣，完全被共產黨所瓦解了。

二十五年春天，共產黨勢窮力蹙，乃傾全力，運用東北失意文人和左傾分子如高崇民等，游說包围張學良和他的左右，在王曲訓練團召開會議，宣傳停止剿共，打回老家去。時王撫洲辦有大路雜誌，爲四維學會的喉舌，并以黨政處長身份，對軍官訓練團作過多次反共剿共的理論性演講，贏得多數愛國家、識大體的軍官支持。然而王撫洲憑藉對付共產黨的四維學會，想不到到了西安，共產黨滲透的結果，四維學會的東北幹部王化一、王卓然、盧迺慶等都變了，不敢活動，祇剩下趙雨時等少數幾位同志反共到底，王撫洲也成了共產黨鬥爭的主要目標。

張學良對於中央某幾位大員懷有成見，認定這幾位大員在壓迫他，非常憤慨，一再對王撫洲表示，要給他們一點顏色看。二十五年秋天，張學良派兵包圍省黨部，并免去王撫洲的一切職務，扣押了反共最力的趙雨時等。

王撫洲覺得情況十分嚴重，曾對剿總參謀長宴道剛說：「副總司令認定中央某些人在壓迫他，共產黨又說讓東北軍剿匪是在消滅東北軍。現在東北軍損失兩個師，中央最好給東北軍補充，至少先補充一師，以事實來糾正張副總司令的觀念，粉碎共產黨的宣傳，否則會發生大問題。」

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

四

也不知道是寧道剛沒有把這個意見向中央表達呢？還是中央沒有接受呢？總之，張學良越來越激動。王撫洲在西安存身不得，張顧慮他處境困難，派他到陝北收復區視察。他奔波了一個多月，同一起視察的人員回到太原，同行的人先南下回陝，他同保定，準備在家裏寫視察報告。就在他回到保定的第三天，西安事變爆發了。張學良要給

中央某幾個人點顏色看，以致羞刀難入鞘，闖下滔天大禍，害了他自己，也害了國家。



組華北忠義救

國軍

西安事變以後，張學良把王撫洲、陳旭東、王卓然戴笠將軍策動經濟作戰頗多貢獻曾被戴笠將軍稱譽為「軍統局的第一枝筆」。

生。七七事變前，王撫洲曾聯絡張慶餘和張硯田。後來戴先生派吳安之專負策反冀東保安隊的責任。七月二十九日冀東保安隊起義反正，解決了通洲的五百多個日本人，率隊奔向北平。因北平封鎖城門，吳安之和張慶餘失去聯絡，他們不知道二十九軍已在凌晨撤出北平，致被敵軍在北平附近擊潰。張慶餘、張硯田逃到保定，由王撫洲陪往南京晉謁委員長和戴笠先生。

此時王天木和陳恭澍在天津，想以陳維藩、史嶽山等組成的灤渝游擊司令部，為游擊隊的基礎。戴笠先生也希望在北方有一支敵後武力，所以委王天木為忠義救國軍北方支隊司令，陳恭澍為副司令，王撫洲為政治部主任，在戰地代行司令職權。王撫洲想以離鐵路較遠的南宮縣為根據地，以警察隊擴編的一千多人，及平原、恩縣張揀臣、李娃娃等部數千人為主力，漸次擴大，使北方支隊壯大起來。

共產黨怕忠義救國軍在北方生根，建立起游擊武力。他們以數倍的兵力，一夜之間，下了太行山，跨過平漢鐵路，突襲南宮的這支尚未健全的武力，被繳械併吞了。這是共產黨吞併抗戰部隊的開始，以後襲擊朱懷冰、張蔭梧，抗日游擊隊都被他們消滅了。王撫洲跑到武昌告狀，面謁委員長，報告了一切。抗戰初期，委員長不願意因為這些小事同共產黨鬧得不愉快，祇好不了了之。王撫洲的游擊夢，真成了夢幻，河北敵區也成了共產黨清一色的勢力。

## 治理蒲城牛刀小試

王撫洲沒有再回北方，戴笠先生報告委員長請准派王到陝西做行政督察專員。不巧正值陝西省新近調整高級幹部，派專員必須等待幾個月，王撫洲自願做縣長，更能學習地方行政。於是先奉派到鳳翔，做了三個月縣長，再調蒲城。蒲城是井岳秀、楊虎城等軍人的故鄉，號稱難治。舉例來說，當時陝西全省積欠的田賦是六十四萬，而蒲城一縣就欠了六十二萬，其難治可見一般。王撫洲向戴先生要了三位臨訓班的幹部，向胡宗南要了三十多位幹四團畢業的學生，薪餉由集團軍總部負責。王撫洲帶了這批祇工作、不要錢的青年幹部到了蒲城，分派到各聯保處工作。

蒲城縣不祇地方惡勢力橫行霸道，也成了共產黨的溫牀。王撫洲先從立威樹信着手，先健全地方機構，次第更換了十分之九的聯保主任，繳了商會的槍械，撤消四區區長，并收繳他們的槍械。進一步強迫集中全縣掌握田賦錢糧冊子的書吏一百多人於縣城，要他們謄清繳出田糧冊。從此掃清了幾百年積弊，縣政府才有了征收田賦的根據。蒲城縣六十二萬欠糧，收回六十萬出頭，當年田賦征收達到百分之一百。

經過一年多的時間，威信大立，對地方人民的思想也調查清楚，乃開始整肅潛伏的共產黨，先擊斃操縱指使的頭目王某，進而撤換了七、八個小學校長，撤換了一百多個小學教員。這一大幫共產黨分子都分別離開了蒲城，才免去一大威脅。以一年半的時間將一個共禍蔓延、土豪劣紳把持的地區納入正軌，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

### 對敵經濟戰的困難

三十年秋天，王撫洲回到重慶，任戴笠先生的機要秘書，處理須經戴先生批閱的公文。那時機要秘書有四位，除王撫洲外，有周念行、尚望、何芝園。王撫洲的主要任務是策劃對敵經濟作戰，指導經濟研究室工作，并兼任經濟會議經濟檢查組副主任，代表軍統局。戴先生對經濟作戰非常重視，二十九年就設有經濟研究室，由鄧葆光負責，蒐集敵區各地金融物價情況，編列報告。

三十一年五月一日將經濟會議改組為全國總動員會議，下設經濟檢查處，仍由中統局、軍統局、三民主義青年團分任副主任，各省設經檢隊，而由軍統局的嚴靈峯任處長，軍統局的責任因而加重了。經檢處的任務為平抑物價、取締囤積居奇和操縱物價。

政府為加強緝私，增加稅收，三十年財政部增設緝私署，各省成立緝私處，下設查緝所。戴先生兼任署長，三十一年四月派王撫洲任主任秘書，以接替余鐸主持署務。

當三十年五月戴先生奉命搶購搶運淪陷地區物資，秉承兼財政部長孔祥熙之旨意辦理之時，原擬專設機構，孔兼部長以為對敵經濟作戰，財政部已有貿易委員會，統制桐油、鵝砂、茶葉，並辦理對外貿易；中央信託局辦理向外採購，擁有大量資金及運輸工具，經濟部已有花紗布管制局、工礦調整處，不必另設機構。戴先生既沒有資金，又沒有機構，教他怎樣搶購搶運。

但是，上述機構祇能管制和調整，既不能增加生產，更不能向敵區搶購。遷延了半年，職權沒有確定，經費沒有着落，戴先生呈請准免兼辦，又沒有奉准。到了三十一年秋天，建議「輸出入聯鎖原則」，即輸出我所管制的物資，必須輸入我需要的物資，以獎勵輸入。十月奉批「以設局辦理為宜，並須從速負責辦理。」十一月孔兼部長批示，定名為「貨運管理局」。

### 貨運局成立不容易

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行政院通過計劃、概算、資金預算，五月五日正式成立。

貨運管理局局長由戴先生兼，副局長王撫洲負實際責任，下設管制處、業務處、財務處、運輸處、總務處、秘書室、會計室、稽核室。全國設六貨運管理處：豫皖區管理處設在界首，王兆槐任處長；湘鄂區管理處設在三斗坪，朱若愚任處長；蘇浙區管理處設在龍泉，趙世瑞任處長；福建區管理處設在南平，江秀清任處長；廣東區管理處設在韶關，李崇詩任處長；廣西區管理處設在柳州，楊繼榮任處長。

貨運管理局工作方針：(一)管制對淪陷區輸出入，實行實物結算制度，限制輸出，獎勵輸入。(二)獎助商民搶購搶運。(三)協調各物資管制及運輸機構，協助商民，予以便利。(四)自設業務運輸機構，辦理商民無力搶購搶運的工作。(五)破壞敵人的金融及經濟。

資金原擬三億五千萬元，為時七個半月，始撥到一千萬元，和有關機關商洽也難獲協議。戴先生於六

月二十七日、七月二日兩度辭職，呈述困難：（一）搶購紗布，花紗布管制局官價低於前方，虧賠的款項不給補撥；（二）桐油輸出，經貿委員會核准，外匯管理委員會結匯，手續輾轉，兩個月辦不妥；（三）江浙生絲上市，須向「復興公司」洽商，洽商一個多月才有頭緒；（四）五金、機器等須向工礦處報運，否則不能內運；（五）主張修改戰時管理進出口物品條例，簡化手續，經過半年也得不到結果。

敵人呢？以大東亞省爲指導機關，以中支那爲實行機關，調用商人參加軍隊的經理部和經濟班，按照既定政策，因時因地制宜交換的比例價值，靈活運用，效力很大。我們同敵人比較，經濟作戰顯然是失敗了。委員長將這件報告批交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辦理，他才知道我們的管制機關給予商人許多不便，阻礙物質內流，應該趕快調整改善。

王撫洲提出兩項簡單的辦法：（一）經貨運處登記的輸入物資，憑登記證通行無阻，到後方後，由管制機構收購。（二）貨運局搶購的物資，一律交主管機關收購，照成本加管理雜費，不加任何利潤和其他費用，獲得孔副院長同意。

八月十日財政部通過：（一）實物比例結算辦法，（二）配合調整職權改進辦法，（三）撥八千萬元資金外，准向中央銀行借款週轉。搶購搶運物資才積極開展工作。

## 六千件綿紗運後方

各管理處站成立後，最顯著的效果是：（一）凡登記的貨物，免去許多管制手續的麻煩，運輸便利，商人稱便，成爲商貨內運的保護人；（二）各管制機關接到登記通知單，貨到收購，沒有削減他們的法定職權，也感便利；（三）管理局每月彙集各處登記表報，編成統計，報告財經各部，瞭解輸入物資概況。

當時，汽油的來源因玉門油礦的生產和美軍的供應，已不嚴重。五金、西藥因美軍來華，嚴重性也已減少。最嚴重的是紗布衣着，陰丹士林布成了囤積保值的對象，供應更加缺乏，所以搶購綿紗，成了迫切的需要。

和杜月笙有密切關係，在上海和敵人週旋的徐采丞聲稱，能買通日軍，由上海運進紗布。於是，戴先生和杜月笙商妥，由杜組織通濟公司，自任董事長，楊管北任總經理，徐采丞任副總經理。對於通濟公司的報酬，是照貨價加百分之三十的管理、雜費、運費收購。

當時敵人不認爲綿紗是軍用物資，徐采丞以八百萬美金購買綿紗六千件，每件四百磅，共二百四十萬磅，兩千磅爲一噸，合一千二百噸。這樣重的貨物，運輸起來是相當困難的。於是決定，三千件由水路裝船運往浙江淳安交貨，由淳安貨運管理站點收，就近交給第三戰區軍需機關，製造軍服，不再內運。

另外三千件陸運，由上海裝上火車，到南京轉京浦路，到徐州再轉隴海路，到十字河荒僻小站卸貨。十字河到界首一百五十里旱路，由架子車裝運，每輛祇能裝運一件，集合了五百輛架子車，需要跑六趟，才能運完。十字河到界首一帶叫做陰陽界，就是我敵交界。是偽軍郝鵬舉的防區，郝已經識先生策反成功

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

一



戴笠將軍和軍中情報員對日戰作報情影留時

，由他負責保護，三千件綿紗才能够平安運抵界首。界首到洛陽三百八十里可用汽車載運，洛陽到西安有隴海路，運輸更不成問題。這三千件綿紗運到西安，解除大後方紗布缺少現象，是極大的幫助。

除了搶購搶運物資，以解除後方困難外，并運用各種手段破壞敵人金融幣制，以瓦解其經濟體系，也很著成效。

貨運局是王撫洲努力策劃的結果，由他負責主持。三十三年劉茂恩任河南省政府主席，邀王撫洲任財政廳長。他以為貨運管理局的工作重要，戴先生一定不會放他走。想不到戴先生是一位不以人才自私的人，竟會慨然答應劉主席

，並且要王撫洲推薦一位繼任副局長人選，這種磊落胸懷，真出他意料以外。

王撫洲推薦了三位人選，第一位是軍統局的資深同志，第二位是和戴先生私交很深的朋友，這兩位都曾參加經濟作戰工作。第三位是留德的經濟博士，大學教授，做過福建財政廳長的張果爲，和戴先生無一面之緣，結果戴先生選擇了張果爲。他的氣度恢宏，用人唯才，可見一般。

### 對於戴先生的觀感

王撫洲追隨戴笠先生數年，接觸機會較多，他對戴先生的認識，相當深刻。他說：「一般人評論戴先生，都佩服他的英勇果決，雄才大略，這是不錯的。不過戴先生的事業成功，更由於他有幾點過人的長處：一是博聞強記，二是謙遜週到，三是處事把握重點而又意志集中。」

「所謂博聞強記，就是記憶力強，能把握所聞所見，領會貫通，牢記在心，遇到有關問題，不待調卷查資料，就可加以判斷處理。他的工作性質，接觸面最爲廣博，能够博聞強記，是他成功的重要資本。關於人事，他能把各地工作的中級幹部千人以上的名號身世，記得清清楚楚。某一幹部曾在某處對他說過甚麼話，記憶無誤，重大問題和重要人的談話，更不要說了。」

「關於謙遜週到方面，也可從小事看出來。戴先生對於黨政軍閥人，不論年齡地位，寫信總稱先生而自稱『晚』。每逢過年過節，對重要幹部送錢送禮，皆親自檢點，恰合身份，決無遺漏。某一同志健康不

佳，則送魚肝油、維他命之類。這些細節小事，都是親自處理，從不疏忽。

「戴先生身兼十餘要職，指揮數十萬人，所屬機構遍及國內各個角落，如果不能授權分責，而因擾於例行公文，累死也辦不了。他不獨肯於授權幹部，而且能够分別輕重，把握要點，集中意志，祇處理最急切重要事項，不理其他。緝私署和貨運局的例行公文，有時被積壓月餘，未奉批示，却在時間給解決了。但是遇見急要問題，則急如星火，必須夜以繼日趕辦，送呈批閱。遇見急要問題，戴先生則擱置一切，集中意志，專心致志，以獅子搏兔的力量去處理。」

王撫洲認為戴先生的文章，也有他獨到的地方，可以說是獨具風格，斬釘截鐵，爽朗暢達，簡單明瞭；不用辭藻，不加修飾而自成文章。有位朋友曾說：「以主管人物而言，寫的文字最多的，莫過於戴先生。」這話是實在的。凡是重要公文，必然親批。重要問題，不厭其詳的用書面指示。對於重要幹部，則常給書信指導，而對委員長的報告，也常親自起稿。但是寫得很多，却從來不用行草字，而是一筆不苟的楷。

有一次戴先生正在親自草擬一件上委員長的報告，王撫洲去見他，他將文稿遞給王撫洲，要他斟酌修飾。王撫洲反覆看了幾遍，認為不能改易一字，勉強修改幾字，反而不如原文。然後坐下閒談，戴先生說出他對文章的見解。認為好文章必須有見識，要能將材料組織安排好。至於修飾辭藻，運用文字技巧，則是次要的。王撫洲至今回憶起來，對於這種見解，還是非常佩服。

最後，王撫洲想起戴先生和他的一樁預約的話，成爲永遠解不開的謎，引以爲憾。三十四年中秋節中午，戴先生頗爲清閒，邀王撫洲和朱惠清到曾家岩公館便餐，談天說地，閒聊一陣。忽然戴先生說：「我要考考你們兩位的記憶力。有一個問題，關於某一個人，我現在不說。你們誰的記性好，到明年今天再來問我，我再相告。」因爲他慎重其事的要考王撫洲的記憶力，而又出以有趣態度，所以牢牢記住，而且寫在日記中，明年中秋，踐約詢問。不料半年以後，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飛機失事，戴先生殉職，不出三年，政府也播遷來台。王撫洲回首前塵，這一預約也就成爲永遠無法解答的啞謎了，思之猶有餘痛！